

西方媒介镜像下的内蒙古形象

——以《纽约时报》为例

□ 刘国慧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13)01—0075—3

【内容提要】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选择《纽约时报》作为研究对象,对1979年至2011年我国改革开放后《纽约时报》关于内蒙古地区的报道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纽约时报》对内蒙古自治区的报道倾向主要以负面报道为主,其背后隐藏着美国式的单极思维和双重价值标准,以及意识形态、文化差异、西方传播价值观等多重影响因素。

【关键词】改革开放;《纽约时报》;内蒙古自治区;内容分析

一、研究动机

内蒙古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转型,随着与外界信息沟通的逐步增加,对外交流活动也日益频繁。但囿于地理位置的偏远和观念意识的闭塞,作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和可发展前景却鲜为人知,海外受众对其了解更是少之又少。长期以来,贫穷落后成为内蒙古地区的象征性符号,甚至在改革开放30年后,内蒙古地区已取得长足发展,而这种刻板印象仍然没有改变。

作为西方“主流声音”的代表,美国的《纽约时报》可谓西方主流世界的舆论领袖之一。鉴于此,本文选择《纽约时报》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对1979年至2011年《纽约时报》关于内蒙古地区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考察西方受众通过《纽约时报》这面镜子形成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媒介镜像及其生成原因。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纽约时报》1979年至2011年间关于内蒙古地区的报道进行分类统计,包括报道总量、报道主题、报道性质等,运用SPSS16.0对样本进行交叉分析和交互分析,将SPSS16.0获得的统计数据输入Excel2003制成图表,进行描述性分析。

(二)样本的选取

在ProQuest Databases中的《纽约时报》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inner mongolia”,时间范围设定为1979—2011,出版物类型选择“报纸”,搜索结果有354篇报道。在这些样本中,人工逐一剔除偏差样本(重复、歧义)和弱相关

文章(更正、撤回类新闻),有效样本共计214篇。需要申明的是,在选取的样本时间段内,《纽约时报》以内蒙古为主要对象的报道并不太多,所以笔者所选取的214篇报道中包括了一些并未以内蒙古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文章,选取标准是只要在文章中提及内蒙古或与内蒙古相关的内容,如“呼和浩特”即可。

三、内容分析

(一)报道总量的分析

1979年至2011年各个年份的报道篇数如图1所示,我们可以看到1979年和1995年《纽约时报》没有关于内蒙古的报道,而报道量最多的年份是2011年,多达20篇。从图中数据线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纽约时报》对内蒙古地区的报道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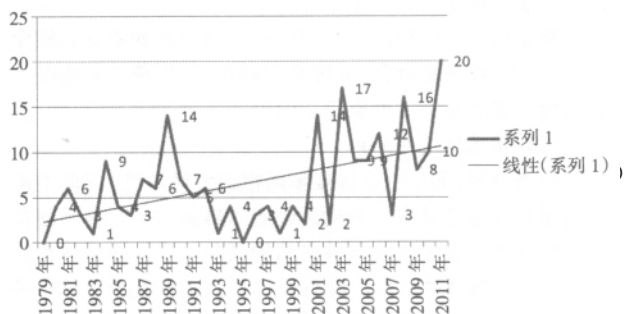


图1 《纽约时报》1979年—2011年对内蒙古地区的报道数量

(二)报道主题的分析

关于报道主题的分类,笔者遵循各专家学者对新闻内容的传统划分原则,并根据报道的实际情况,将《纽约时报》1979年至2011年间对内蒙古的报道分为政治新闻、经济新闻、科技新闻、文化新闻、社会新闻等。

据篇数统计,《纽约时报》在改革开放后对内蒙古地区

【作者简介】刘国慧,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编号:09YJC860009。

的报道主题主要集中于社会生活方面,有 62 篇报道,占总报道量的 29%;其次是政治方面的报道,有 61 篇,占总量的 28%。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报道篇数分别是 46 篇和 39 篇,而报道内蒙古科技方面的文章只有 6 篇。

通过表 1 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纽约时报》对内蒙古自治区政治方面的报道主要集中于民族矛盾方面的内容。在这些报道中,半数以上都是报道自治区内部汉族与蒙古族的矛盾冲突,其余内容涉及内蒙古与邻国蒙古国之间的民族情绪。其中不乏一些看似经济类、文化类的新闻,但其落脚点却在民族矛盾上。例如 2004 年 11 月 26 日的报道《蒙古人带着他们的重金属来到中国》,新闻开头便交代了 11 月 1 日 HURD 乐队在呼和浩特的演出被取消,为防止骚乱,警方把演出大学校园封锁。文中大量引用了乐队成员的话:“2000 年时,演出还是很苏维埃式的,聚光灯下有很多警察,音乐会非常有秩序,现在轻松多了,就像很多摇滚音乐会一样了。但即使这样,他们也不让我们说‘我们蒙古人在一起!’或者‘所有蒙古人站起来,跟我大声喊!’这样的话。人们只能大喊‘成吉思汗’,但这一点政治意义都没有。”这篇新闻看似文化新闻报道,但对内蒙古自治区民族现状乃至中国民族政策的质疑态度显而易见。除此之外,《纽约时报》对内蒙古自治区的政治局势的关注还集中在人权、宗教、游行等一些负面事件上。

与政治报道相比,《纽约时报》对内蒙古自治区经济方面的报道显得中立了很多。一些新闻肯定了内蒙古经济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尤其关注乳业、羊绒资源、风力能源和矿产资源这几方面的产业发展,例如:《亚洲的风力涡轮机成为世界关注焦点》、《中国的羊绒发展令苏格兰汗颜》等。而更多的经济新闻报道重点集中在内蒙古经济发展带来的不良后果上,涉及贸易纠纷、旅游业及灾害损失等内容。

在社会新闻的报道中,对天灾人祸的报道量最大,共有 27 篇,尤以 2003 年的“非典”报道和 2008 年牛奶“三聚氰胺”事件报道最为突出。关于人物方面的报道在社会新闻中所占比例也不小。

综上所述,《纽约时报》对内蒙古自治区的关注比较全面,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都有涉及,但内蒙古自治区在这份世界级大报上的形象仍旧模糊。

(三)报道性质的分析

报道性质,即报道立场或新闻报道的倾向性。新闻的倾向性是新闻报道者在报道或评述新闻事实时或直接明显或含蓄隐晦地表现出来的一种必然的倾向,它往往能体现新闻报道者或媒体的立场。杨保军称,“我们把能给主体带来正面效应(正价值)的新闻事实称为正面事实,带来负面效应(负价值)的称做负面事实,正负效应不明显或无所谓(零价值)的事实称之为中性事实。”对相应事实的报道所形成的新闻就是正面新闻、负面新闻和中性新闻。

在《纽约时报》自 1979 年到 2011 年对内蒙古自治区的 214 篇报道中,负面新闻占据了最大比例,共有 135 篇,占总数的 63%;正面新闻有 64 篇,占 30%;中立态度的新闻 15 篇,仅占总数的 7%。结合上述报道主题的分布,我们发现,《纽约时报》比较关注内蒙古地区的负面事件,在报道中呈现的态度也以负面为主。

根据《纽约时报》对内蒙古报道内容和态度的交互分

析,我们看到,61 篇关于政治方面的报道基本上都是持负面态度,且绝大部分都把重点集中于蒙汉民族矛盾。经济方面,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数量相当,持中立态度或倾向性模糊不清的报道有 3 篇。在这些报道中,《纽约时报》对内蒙古的羊绒、能源、矿产方面的迅速发展给予了正面肯定,持负面报道态度的经济新闻大都报道内蒙古经济发展迅速带来的灾害、损失以及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等。对文化方面的报道态度以正面为主,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地区考古成就、艺术成就等方面的报道,6 篇关于科技方面的报道全部为正面报道。

态度	阶段	正面态度	中立态度	负面态度	合计
	1979 年—1989 年	35	5	60	100
	1990 年—2000 年	30	11	59	100
	2001 年—2011 年	28	6	66	100

表 1 《纽约时报》1979 年—2011 年对内蒙古报道的阶段与态度交互(%)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纽约时报》从 1979 年至 2011 年对内蒙古地区的以负面报道为主,总体上呈现歧视与偏见的态度。

三、结论与讨论

(一)“钟摆”效应——《纽约时报》镜像下的内蒙古形象分析

很多学者把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比作钟摆,不断在“爱与恨”之间摆动。通过对《纽约时报》1979 年至 2011 年关于内蒙古自治区报道总量、报道主题以及报道倾向性的内容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纽约时报》建构的内蒙古媒介形象:

1. “内蒙古是中国北部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贫穷、落后是《纽约时报》提到中国内蒙古地区使用最多的词语,无论是描述内蒙古的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文化现象,报道中总会出现内蒙古气候恶劣、人民生活水平低、生态环境差等词句,比如一篇报道内蒙古乳业发展的新闻中,出现了大量描述牧区奶农生活工作环境的词语:“a dusty little village”(一个尘土飞扬的小山村)、“a set of tattered, makeshift barns”(破旧简易的牲畜棚)、“narrow, manure-piled streets”(狭窄、布满粪便的小路)、“unpaved streets”(没有铺石砖的街道)等等。《纽约时报》将内蒙古自治区的落后面在报道中不断强调,这种主观性强的随意架构凸显了西方媒体涉华报道惯用的新闻框架。大众媒介是形成并限定公众假设、态度和情绪的一种重要社会力量,它以无孔不入、广为接触以及突出符号的能力,为社会不同部分命名,只有经过它们确认的现实才是现实。^①这也证实吉特林所说的,是媒介框架使得超越于人们直接经验之外的世界看起来是自然的。^②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选择现实的某些方面在传播文本中加以凸显”,^③在对内蒙古的报道中,《纽约时报》一方面强调内蒙古作为中国边远地区的落后与贫困,另一方面认为中国政府、内蒙古地方政府和中国人口最多的汉族人民对此负有责任。这种新闻框架往往决定了人们对某一现象的关注点和价值判断,并界定了个人、政府等不同社会单位在某一事件中的角色和责任。

2.“蒙古族生活在汉族的统治与控制下。”

《纽约时报》力图表达对“被汉族控制”的蒙古族大众的怜悯之情,极力塑造蒙古族隐忍愤懑的民族形象,明显带有对民族动乱的行为定义为“合理反抗”的议程设置。从报道主题上分析,《纽约时报》在提及内蒙古政治问题的时候,倾向于采用一些贬义词对其进行定性。在大量报道内蒙古地区民族矛盾的政治新闻中,《纽约时报》频繁提到的是蒙古族已经被汉族同化,毫无民族自主性,甚至引用一些模糊不清的消息源来佐证其观点。在报道蒙古国金属乐队来内蒙古演出的新闻中,记者更是引用乐队成员的话来证明内蒙古地区蒙古族民族情绪的激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我们想保持蒙古人的语言和习俗’,我遇到过一个有着蒙古名字的人,他大喊着‘我是蒙古人!’在中国,我遇到很多这样的人。”^④此外,只要谈及内蒙古地区的政治形势,哪怕是一件小事,也言必称“民族矛盾”、“民族冲突”,使受众在第一印象中就留下了诸如“动乱”、“镇压”、“同情”、“无辜”等判断词语。

《纽约时报》对内蒙古的政治形势进行主观揣测和错误判断,夸大了内蒙古地区在民族矛盾、未来政策上的问题,对与稳定、发展等相关的内容自动屏蔽。通过对内蒙古民族问题的事件和信息进行选择 and 加工,对其加以重构之后,向美国受众提供了负面报道占据主导地位的新闻内容。

《纽约时报》极力塑造一个贫困、不安定的内蒙古形象,并长期向西方受众灌输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灾难频发的信息。正如“托马斯公理”所说的,如果人们将某种状态作为现实把握,那状态作为结果就是现实。^⑤而形象一旦形成,便会很快变为一种客观存在,很难改变。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随意臆断和过度解读以凸显政治泛化偏向,是《纽约时报》对内蒙古报道的典型写作手法,也是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惯用写作方法:政治上从个案入手,由此及彼,多角度多层面地片面批评中国;在经济领域,利用双重标准对中国进行负面报道。^⑥这种常用写作手法背后隐含的是美国式的单极思维和双重价值标准。这种表面上的“用事实说话”、“客观报道”,实则存在巨大隐性偏见的虚伪传播理念极大地影响了内蒙古乃至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健康积极的国际形象的塑造。

(二)傲慢与偏见——《纽约时报》对内蒙古自治区的误读分析

《纽约时报》对内蒙古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旅游等领域的报道均带有浓重的政治化色彩,很多报道贯穿着明显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

所谓的西方民主价值观成为美国新闻从业人员看待国际事务、思考国际问题的标尺。大众传媒作为美国社会的重要一环,无法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共识。涉及国际报道时,媒体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在国内事务报道中更加突出和明显。《纽约时报》作为美国最有分量的报纸之一,虽然标榜客观中立的新闻报道立场,但是在涉及中国的报道时仍然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

另一方面,西方媒体崇尚自由。在西方传播学界看来,“新闻界必须是对政府的一个制约,是政府的一个批评者,或者是监察政府的看门狗,这种想法促成了过分活跃和好争斗的新闻业,它滋养了一个观念——即政府必须是邪恶的,政府的邪恶是其本质所固有的,因而必须被监控。”^⑦他

们对中国的官方信息始终持怀疑态度,《纽约时报》对内蒙古的报道中更多地采访普通人民、“持不同政见者”以及任何能反映内蒙古变化的人。而这些报道也都侧重于耸人听闻的新闻事件或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冲突性事件等。尤其在涉及民族问题和人权问题上,报道的措辞往往苛刻而尖锐,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片面性。对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不是选取探究何以成功的视角,而是以一种质疑的口吻,选取问题视角去反映发展带来的任何不良影响。

美国的新闻媒体从其新闻选择的原则来看,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迎合受众的口味,考虑新闻在受众中的受欢迎程度以及能为媒体带来多大的利润和影响力。因此,在报道中忽略事件的全过程及背景,忽略报道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就成为美国媒体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对某一事件有侧重的报道可能在读者或观众中形成并不准确和有失客观立场的判断,误导公众舆论。^⑧这样的新闻消费主义价值观体现在美国媒体对华新闻报道上,那些与“民主”、“自由”相冲突的“蒙汉矛盾”、“民族镇压”、“政治游行”等主题便成了报道重点。

四、结 语

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西方媒体上出现了一些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事实不符的相关报道,批评或攻击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报道不时出现,负面议题纷然杂陈。尤其是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西方媒体上的负面舆论形成合围之势,对我国整体国际形象带来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及媒体在面临危机事件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也时常成为国际舆论评判中国的重要依据。

内蒙古作为中国发展速度最快,政治最稳定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的崛起过程代表着中国的腾飞,因此她的发展必然遭遇国际形象问题。由于西方媒体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媒介形象的刻画带有明显的双重标准和意识形态特色。因此,要改善内蒙古自治区的国际形象,不仅需要内蒙古地方政府更加努力地发展自身的经济文化,还需要地方媒体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国际传播,将一个真实、全面的内蒙古形象呈现在世界眼前,从而消除外媒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曲解。■

参考文献:

①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

②吴芳如:《消息来源、新闻框架与媒介真实之建构:以政党轮替后之核四争议案为例》,台北: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35页。

③Entman,R.M.,Framing:Towards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3,vol.43,No.4.

④⑤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

⑥⑦埃弗利特·E·丹尼斯、约翰·C·梅里尔著,王纬等译:《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⑧刘华蓉:《大众传媒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